

康熙·臺北·湖，信之有乎？

Kangxi Taipei Lake, Believe It or Not?

謝英宗 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企劃組

Shieh, Ying-Tzung Exhibition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66

「康熙臺北湖」存在與否一直是個爭論的議題。最早嘗試描述「康熙臺北湖」的是陳正祥教授，陳正祥教授利用郁永河所著《裨海紀遊》的文字記錄和陳夢林所繪《諸羅縣志》的〈干豆門與靈山宮圖〉來推測「康熙臺北湖」的水域面積，他推測當時的湖岸應和今日10公尺等高線一致，推算該湖的面積大約為150平方公里，陳正祥稱該湖為「古臺北湖」。但林朝棨教授認為臺北盆地有由東南向西北傾沒的現象，所以當時的等高線位置與現今的等高線應不相同，因此不認為水域面積有陳正祥教授所描述的那麼大，但林朝棨教授並沒有明確的指出該湖的水域面積應該有多大。林朝棨教授又認為臺北盆地的沉積史上曾數次被水域所覆蓋，「古臺北湖」並無法分辨是那個時期的臺北湖，因此才將發生在康熙年間，陳正祥教授所稱的「古臺北湖」改稱為「康熙臺北湖」。

「康熙臺北湖」是一個歷史事件，也是一個自然事件，在現存的史籍文獻中可以發現在康熙三十三年大地震造成「康熙臺北湖」的前後都有文獻可供稽考，其中比較重要而且可靠的文獻和年代如下：

1654年荷蘭人所繪製的〈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

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地震地陷。

1697年郁永河所著《裨海紀遊》。

1717年陳夢林所繪《諸羅縣志》的〈干豆門與靈山宮圖〉。



圖1 1654年荷蘭人繪製的〈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彎曲的河道是基隆河。

上述三項史料文獻的真實性和可信度直接影響「康熙臺北湖」的存在與否的證據，本文嘗試整理上述三項史料的考證，說明史料的可信度，並討論「康熙臺北湖」的真象。

康熙地震前的臺北盆地

臺北盆地呈三角形，盆地面海拔低而平坦，最低

處在盆地西北方的關渡一帶。地質學者對臺北盆地的成因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鄧屬予教授認為歸納起來可以分成兩類：一種是堰塞湖盆；一種是構造盆地。整體來說，這兩種論點並不矛盾，因為構造斷陷說著重的是構造作用所造成的半地塹盆地架構，而堰塞湖盆說反應的是盆地形成後的堆積史。臺北盆地自構造作用陷落形成至今，由於盆地地面低平，

因此很容易受區域構造運動或全球性的海水面升降所影響，也因此臺北盆地數度為水域所覆蓋，湖水有淡水、有海水，也有半淡水，最近10,000的全新世以來，臺北盆地可能以全新世中期距今約7,600年前的「松山期臺北湖」水域面積最大，而最近的一次應該就是康熙年間因為地震地陷所造成的「康熙臺北湖」。

雖然現存有關北部地區最早的古地圖是1626年西班牙人繪製的，但臺北盆地出現在古地圖中描繪較詳細且精確的，當推1654年荷蘭人所繪製的〈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圖1）。根據翁佳音先生的考證，荷蘭人在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往海外

67

擴張的過程中，就相當重視航海與地圖的繪製，其成果和貢獻也倍受後來的研究者所推崇，荷蘭人佔領臺灣之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繪製了多幅的臺灣地圖。就〈淡水與其附近村社暨雞籠島略圖〉的地理學意義而言，該幅地圖明確的告訴我們，在康熙33年(1694年)大地震發生之前，臺北盆地面已經完全出露，而且盆地上也有許多當時的原住民活動，尤其是古地圖所描繪的基隆河下游的幾個灣道，和附近的平埔族村社，都和現今頗為接近。根據翁佳音先生對該幅古地圖考證後，彙集成《大臺北古地圖考釋》一書，認為該幅地圖雖然有一些地名和現今通用的說法不一致，但該幅地圖的記載詳實，科學價值非常高，可說是一幅相當精確的古地圖。

《裨海紀遊》內容的真實性

對郁永河所著《裨海紀遊》研究最深入的首推方豪教授，方豪教授在1950年就對《裨海紀遊》做過詳盡的校註，他當年列出20個《裨海紀遊》的版本，其中已見和未見的版本各10種。而今日通行的《裨海紀遊》版本，則是1959年方豪教授根據屑玉叢譚版本為底本，再參酌其他各版本的校勘本。《裨海紀遊》可以說是研究臺灣早期歷史最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因為黃叔璥所撰，成稿於雍正2年(1724年)的《臺海使槎錄》中就有許多內容是引用自《裨海紀遊》。

《裨海紀遊》一書中關於「康熙臺北湖」的文字描述如下：「初二日，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舶，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濶為大湖，渺無涯涘。行十許里，有茅廬凡二十間，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張大為余築也。余為區畫，以設大鑊者二，貯疏土者六，處夫役者七，為庖者二，余與王君、顧君暨臧獲共處者三；為就地勢，故錯綜散置，向背不一。張大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

里，中為平原，惟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怖恐，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滄桑之變，信之有乎？既坐定，聞飛湍倒峽聲，有崩崖轉石之勢；意必有千尋瀑流，近在左右，晝夜轟耳不輟；覓之累日，不可得見。」由於文字記載不同於圖像，我們無法從文字的描述與現今地形作比對，因此無法直接從字裡行間得知其文字敘述的真實性，所以筆者嘗試由《裨海紀遊》其他的文字紀錄來檢驗該書的可信度。

《裨海紀遊》記載郁永河由廈門出海經澎湖輾轉到臺灣，他在澎湖稍作停留時有這樣的一段際遇：「頃之歸舟，有罟師鬻魚者，持巨蟹二枚，赤質白文，厥狀甚異，又鯊魚一尾，重可四五斤，猶活甚，余以付庖人，用佐午炊。庖人將剖魚，一小鯊從腹中躍出，剖之，乃更得六頭，以投入水中，皆游去，始信鯊魚胎生。」從這段文字看來，郁永河以前可能聽過鯊魚胎生，但未曾親眼目睹，在澎湖停留的這段奇遇，才讓他眼見為真。《裨海紀遊》中也記載，「一日，甫就枕，殘燈既熄，帳前火光如盞，碧色，去地三尺許，知其燐也；審視久之而滅。」，「又一夕，就寢未寐，余視屋外火光如箕，赤色耀目。余以見慣不怪，顧君駭曰：『君榻下何故燃燭？』余笑曰：『火從君枕畔來，照吾榻下，君試反顧，必有所見』。顧君遽躍起，方結衣褲，欲出戶，火光漸滅。」一般人夜間在荒郊野外見到燐火，必定相當驚恐，不過郁永河對曠野燐火的現象不但見慣不怪，還知其所以然，可見郁永河有相當高的科學知識水準。《裨海紀遊》中還有一段關於氣象的記述：「占颱風者，每視風向反常為戒：如夏月應南而反北，秋冬與春應北而反南(三月二十三日馬祖暴後便應南風，白露後至三月皆應北風；惟七月北風多主颶)，旋必成颶，幸其至也漸，人得早避之。又曰：風四面皆至曰颶。不

知颶雖暴，無四方齊至理；譬如北風颶，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二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傳遍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颶驟而禍輕，颶緩而禍久且烈。」這段文字敘述颱風的風向會隨著颱風的位置不同而改變，「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而且說颱風來得急去得快，禍害就會小一些；如果周旋的久禍害就會很嚴重，這些對颱風的描述和現今科學知識完全吻合。除了颱風之外，這段文字對臺灣季風型氣候的描述也是正確的，臺灣冬天吹東北季風、夏天吹西南季風，和郁永河所稱的「夏月應南、秋冬與春應北」也可相互印證。由《裨海紀遊》對其他自然現象記載的考證，筆者認為可以驗證郁永河乘海船進入臺北盆地時對所見到景象的描述是可信的。

《諸羅縣志》的可信度

《諸羅縣志》是康熙55年(1716年)5月開始編纂，康熙56年(1717年)2月完稿，同年4月完成木刻印板，因受朱一貴事件影響，至雍正2年(1724年)始

刊行。《諸羅縣志》的編修緣於周鍾瑄見《臺灣府志》(高志)中對於諸羅縣的記載不夠詳實，遂呈文請修邑志。《諸羅縣志》的主修者雖為知縣周鍾瑄，但實際編纂者為陳夢林、李欽文與林中桂三人。《諸羅縣志》雖然不是臺灣第一本方志，部分體例亦承襲高拱乾的《臺灣府志》，但內容卻有超越前人的用心與獨樹一幟的風格。在其後的方志亦有以之做為範本，可見該書的價值。

《諸羅縣志》以史料精確著稱，該書中寫道：「…以予所見，臺灣輿圖不下數十幅，未有得其真者。大率強為牽合，易東而西、將甲就乙，求無所遺漏於影響疑似之間；而不知其舛錯謬戾之較遺漏尤甚也。苟按圖以為實，然其貽誤豈小哉！故茲圖於道路、山水、莊社、汎塘，各就其最確者，次第其遠近東西，使皆有定位可指；凡涉影響疑似者略焉」。書中又說「邑治山川叢雜，郡志多所缺略，故校勘特詳，凡三易稿而就；務使枝節脈絡井井分明，流峙高深各見生動。庶幾碧水青山本來面目，不致盡被作者塵封耳」並強調「茲卷或躬親遊歷，或遣使繪圖，三復考訂，乃登記載。假而千秋百世，陵谷依然，雖未敢謂毫髮無爽，亦庶幾得其大概」，對於書中所載內容他幾乎事必躬親的逐一檢視，特別是對地圖的描繪，力圖做到「或躬親遊歷，或遣使繪圖，三復考訂，乃登記載。」由此可見他對附圖的把握與用心，亦足證他對內容正確性的信心和掌握。

〈干豆門與靈山宮圖〉(圖2)中有關臺北地區的紀錄除了臺北湖之外，靈



圖2 《諸羅縣志》山川總圖北部的〈干豆門與靈山宮圖〉，著色部分為水域。

山宮(即今之關渡宮)也是重點之一。康熙53年(1714年)周鍾瑄北巡至雞籠、淡水，並登八里坌山(今之觀音山)，並在康熙54年(1715年)改天妃廟為靈山宮。根據《諸羅縣志》的記載「天妃廟：在淡水千豆門…五十一年(1712年)，通事賴科鳩眾建；五十四年(1715年)重建，易茅以瓦，知縣周鍾瑄顏其廟曰靈山」，因周鍾瑄親自遊歷到過臺北，足證史料的可信度。

1717年陳夢林所繪《諸羅縣志》的〈干豆門與靈山宮圖〉，清楚的描繪出臺北盆地部分被水覆蓋的景象，雖然〈干豆門與靈山宮圖〉是以中國的山水寫意方式繪製，沒有精確的比例，不過我們仍然可以藉由幾個地理單元來討論該圖對臺北盆地描繪的可信度。首先是八里坌山(今觀音山)和淡水城分處淡水河河道兩側，沿淡水河進入臺北盆地會經過干豆門(即關渡隘口，現已拓寬)，然後是靈山宮(現名關渡宮)，上述這些都與現今的地理位置吻合。另外，〈干豆門與靈山宮圖〉淡水河河道近出海口處中央有個沙洲，有學者認為那是現今位在中興橋下，三重附近的沙洲，其實不然，因為這兩者位置相距甚遠，〈干豆門與靈山宮圖〉中的沙洲接近淡水河出海口，是一個被稱為「雞心嶼」的沙洲，此一沙洲在其他的古今地圖中亦可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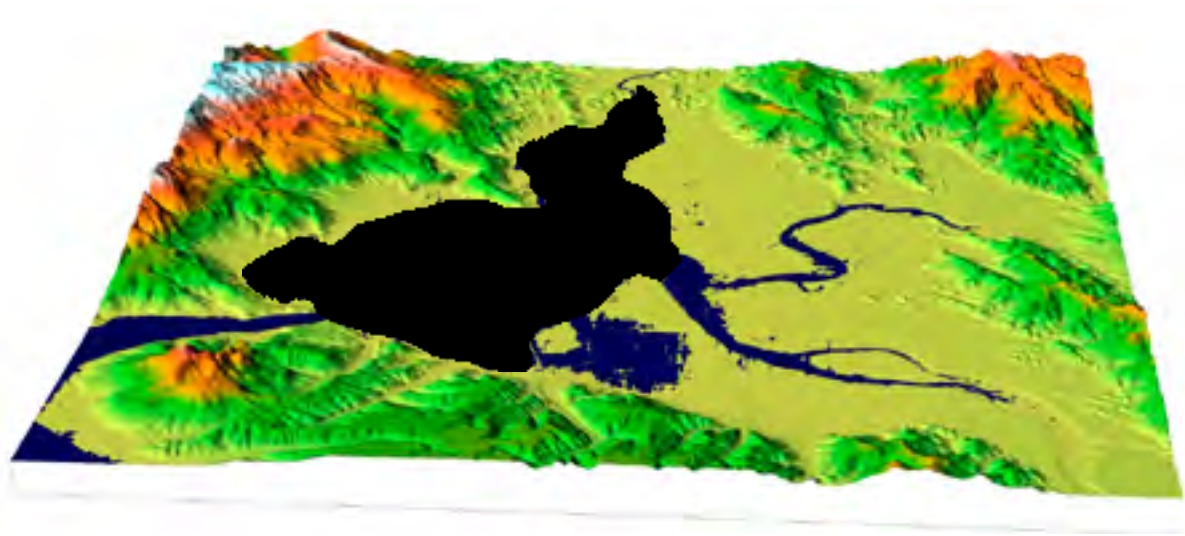


圖3 臺北盆地3公尺以下的區域和位置(林朝宗提供)，本圖與《諸羅縣志》〈干豆門與靈山宮圖〉的差異在於林口臺地東側之積水區，該區域乃臺北盆地因超抽地下水所造成的地層下沉所致。

數位地圖與古地圖的對照

前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林朝宗所長曾嘗試用數位地形圖將臺北盆地的視角調整到與〈干豆門與靈山宮圖〉相近，再將盆地面西北側等高線3公尺以下部分區域以水覆蓋，結果發現現今的數位地形圖和1717年陳夢林所繪的〈干豆門與靈山宮圖〉非常接近(圖3)，雖然新店溪上游的河道和現今不太一樣，不過觀音山、大屯山和西部麓山帶的位置都非常接近，由影像的對比可以顯示該古地圖有很高的正確性和可信度。

康熙臺北湖是堰塞湖還是地陷湖？

徐明同教授曾根據陳正祥教授「康熙臺北湖」湖岸與今日10公尺等高線一致的推測，估計造成如此地陷的地震規模可能達7.0，此一規模的大地震必然造成相當嚴重的破壞(南投集集大地震規模約為7.2)，但為何在當時的文獻上並沒有任何紀錄？這也是許多學者認為「康熙臺北湖」不存在的原因。現在許多學者多認同「康熙臺北湖」的水域面積，並沒有當年陳正祥教授描述的那麼大，換句話說，造成地陷的地震規模也可能沒有徐明同教授估算的那麼大，但地震規模究竟有多大目前還無法確認。

若以中央氣象局的地震測報紀錄來類推，或許可以瞭解為什麼康熙大地震在當時的文獻中沒有留下詳細紀錄的可能原因。2006年4月1日在臺東地震站東方5.5公里處，發生的一個震源深度10公里，規模6.4的地震，臺東的震度為6級，但臺北的震度為無感的0級(圖4)。如果將康熙33年發生在臺北盆地的地震類比為2006年4月1日發生在臺東的地震的話，發生在臺東的大地震，讓距離遙遠的臺北沒有感覺，那麼康熙年間發生在臺北的地震，也可能讓當時位於南臺灣離臺北相當遙遠的臺灣府治絲毫不察，這或許是當年的文獻沒有這次地震紀錄原因吧！

大地震發生之後，常會有土石崩落造成堰塞湖的報導，有學者就認為「康熙臺北湖」有可能是大地震造成土石崩塌的崩積物堵住了關渡隘口的河道所形成的堰塞湖，而並不一定是地面陷落所形成的陷落湖，甚至還舉《裨海紀遊》中「既坐定，聞飛湍倒峽聲，有崩崖轉石之勢；意必有千尋瀑流，近在左右，晝夜轟耳不輟；覓之累日，不可得見。」的文字記載，來說明土石崩落造成瀑布的景象。不過如果是落石崩積物堵住了河道，必然有一道土堤阻斷航道，但郁永河先生從淡水港乘海船進入臺北盆地時並沒有遇到這道土堤，且《裨海紀遊》中記載郁永河一行人「隨行給役者凡五十五人」，且「余以採硫來居臺郡兩閱

月，為購布，購油，購糖，鑄大錢，治刀斧、鋤、杓，規大小桶，製秤、尺、斗、斛，種種畢備。」如此龐大隊伍和所攜數量眾多的器具，如果乘船進入臺北盆地時遇土堤阻斷去路，更換交通工具將會是件麻煩的大事，但郁永河對此並沒有任何記載。再者，郁永河後來踏訪了住處後山的硫磺產地後曾自言：「吾始悟向之倒峽崩崖，轟耳不輟者，是硫穴沸聲也。」可知「飛湍倒峽聲」並不是瀑布流水聲，而是「硫穴沸聲也。」因此「康熙臺北湖」是陷落湖的可能性應較高。

雖然我們目前還無法精確的描繪出「康熙臺北湖」應有的景象，但透過對史籍文獻的考證，筆者相信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對「康熙臺北湖」的描述是可信的，也就是說「康熙臺北湖」存在的可能性相當高。

參考文獻

林朝榮(1960)臺北縣志，卷三：地理志，臺北：臺北縣文獻委員會。
周鍾瑄(1717)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翁佳音(1998)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文化中心。
陳正祥(1993)臺灣地誌(下冊)，臺北：南天書局。
曾美惠、劉平妹(1999)臺北盆地二萬年來孢粉組合與古環境初探。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特刊，11：159-179。
黃叔璥(1724)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鄧屬予等(2004)臺北堰塞湖考證，地理學報，36：77-100。
謝英宗(1999)對《大臺北古地圖考釋》的幾點補充，北縣文化，59：76-79。
謝英宗等(2005)臺北盆地二二八公園鑽井之古環境意義。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58(2)：67-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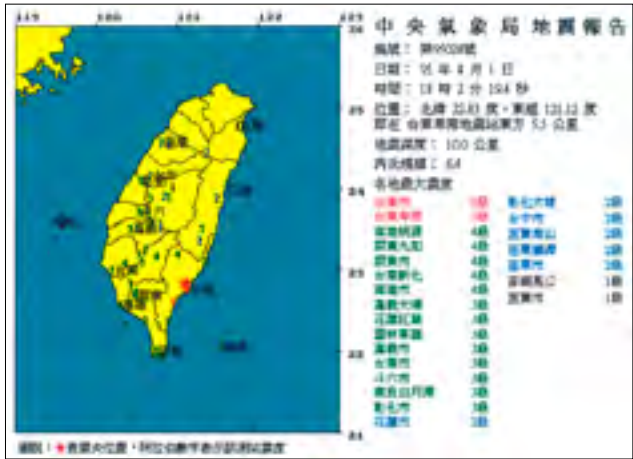


圖4 民國95年(2006年)4月1日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紀錄，該次地震臺東震度6級，臺北市0級。